

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

■ 中共中央第一座无线电台遗址

本报记者 张龙摄



我党通讯史上一次划时代革命

专家
点评

中国共产党在艰险的环境里成功建立无线电通讯,当年直接参与电台筹建工作的李强称之为“我党通讯史上的一次划时代革命”。

1927 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,大革命失败了。我党在白区的斗争转入地下,党中央领导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。为了保持与各方面的沟通联系,加强对红军革命根据地的指导,党中央迫切需要建立秘密电讯。在周恩来的直接部署下,中央特科无线电通讯科的同志们排除种种困难,历经艰辛,以生命和智慧创建了第一个秘密电台,为

党的无线电通讯事业打下了基础。此后,又在香港、苏区根据地设立了电台,中共中央得以有效指导各地工作,各地党组织的相关工作也能及时向中央请示汇报。许多重要情报通过秘密电台准确及时转发中央苏区,对红军作战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党的第一个秘密电台及其通讯工作的建设,使我党我军的电讯事业从无到有,从小到大,逐步发展壮大,在中共无线电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重要意义。

曹力奋(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)

福康里小楼内的“风语者” ——诞生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第一座秘密电台

首席记者 潘高峰

传承 红色基因

如磐的黑暗中,曾经矗立在福康里的石库门小楼,发射出“永不消逝的电波”,那微不可闻的嘀嗒声背后,是近乎传奇般的故事:一台全靠自学组装而成的发报机;一种从未被国民党破译过的密电码;一片无比炽热的理想与忠贞之心。

努力自学 研发电台

冬日清晨,记者叩开东安路上的一处民居。一位白发苍苍、精神矍铄的老太太将记者迎进屋。她是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、离休干部沈忆琴。今年已 87 岁高龄的她,依然耳聪目明。“李强同志晚年曾经多次来上海寻访当年的史料和遗址,我作为工作人员接待过他好几次,还去北京拜访过他。”沈忆琴告诉记者,李强待人亲切,平时总是乐呵呵,但在和他的交往中,却能深切感受到他对党、对革命事业的忠诚。“那是一个地下党员永难磨灭的气质。”

中共中央为何会在上海建立秘密电台?沈忆琴告诉记者,大革命失败后,白色恐怖下的斗争转入秘密状态。秋收起义之后建立的红军革命根据地也处在敌人的封锁、分割中。在此情况下,中国共产党能否迅速建立秘密电讯,保持内外联系,加强革命指导,关系到革命成败。

1928 年 10 月,领导中央特别行动科的周恩来从莫斯科参加六大回到上海不久,就分别约谈了李强、张沈川,要求他们克服一切困难,学会无线电通讯技术,并在中央特科下设立了无线电通讯部门(四科),专门负责建立和管理党的无线电。

“当时的困难,真是很难想象。”沈忆琴说,李强是学土木工程出身,是党内为数不多的工院校校高材生,但他也从未接触过无线电。在当时,无线电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新技术,国民政府对电台严格封锁,完全没有相关的中文书籍。学过一些英文的李强就从国外的资料上想办法。他先是在一本美国的无线电期刊上找到了一张发报机图样,根据这图样绘制出电台线路图和零件图。此外,他又以无

延安高架长龙般蜿蜒而过。镇宁路延安西路口、美丽园大酒店门前一隅,几株翠竹掩映间,立有一块微微高出地面的小小石碑。石碑上刻着这样的字迹:“中共中央第一座无线电台遗址”。下面是几行小字,介绍了遗址概况:“延安西路 420 弄(福康里)9 号”

线电爱好者的身份,与当时在上海经营美国无线电器材的“亚美公司”和“大华公司”的老板交朋友,从那里购买所需要的零件、发动机以及许多有关无线电技术方面的材料。

“我认识李强同志的时候是上世纪 80 年代,那时,他已是高龄老人了。但从他身上和他讲述的故事中,你能感受到那种共产党人为了理想信念,百折不挠的精神。”沈忆琴说,李强还研制过我党最早的炸药。“也只有那种丝毫不考虑个人安危,为了信念不顾一切的人,才能最终获得成功。”

就这样,李强躲在赫德路(今常德路)的一所房子里,照着手绘的线路图样,一次次试制收发报机。1929 年秋,耳机里终于传来了期待已久的电台讯号,李强和伙伴们终于研制出了我党历史上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。

晾衣竹竿 藏入电线

有机器只是第一步,还要有收发报的人,这就要说到张沈川。据沈忆琴回忆,张沈川当时是广州中山大学的学生,担任上海法南区委所属法租界的党支部书记。有一天,他看到报纸上刊登了一则老西门蓬莱路有一所“上海无线电学校”的招生广告,就化名张燕铭,考入了这家国民党开办的无线电学校。由于勤奋刻苦,他学习了六七个月就可以上机,还利用深夜加班的机会,抄下了两本军用电台的密电码,交给党组织。

电台研制成功后,李强和张沈川租下了福康里 9 号一幢三层楼房作为电台的秘密台址。他们还有一个学生兼助手叫黄尚英,当时只

有十八九岁,原来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学过一些电台业务。“自主研发”的收发报机有些笨重,灵敏度不高,发射功率只有 50 瓦,为了隐蔽起见,使用时还得把电线藏入晾衣服的竹竿里,再将发射接收的天线架在三楼阳台或者不易被人察觉的屋脊上。

沈忆琴说,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,一座秘密电台长期隐蔽下来非常不容易。为了破获秘密电台,国民党特务同租界巡捕相互勾结,将定向测试电台装在汽车上,每天晚上在马路上兜圈子,侦测秘密电台的方位。为了能使秘密电台生存下来,李强和张沈川他们在起居生活上严格遵守组织纪律,深居简出,一两年才同家里通一次信,收发报也都在周围居民入睡后的深夜进行。

1930 年 2 月,福康里电台的隔壁开设了一家妓院,每天夜晚人来人往,人员复杂。党组织感到这样不安全,决定另选台址。同年 5 月中旬,电台迁到了公共租界静安寺路(今南京西路)赫德路福德坊 1 弄 32 号,这里比较僻静,西面墙外就是万国公墓,所以比较安全。不久,李强又在慕尔鸣路(今茂名北路)兴庆里 17 号(安吉里 11 号)、长阳路友邦里东一弄 61 号、长阳路乾信坊等处分别设立了电台和装配间。

首条密电 百色起义

为了开通同中共南方局的无线电通讯联系,1929 年 12 月,中央派李强和黄尚英到香港九龙建立电台。

据沈忆琴介绍,这段历史李强后人曾详细回忆:当时李强化装成富商坐在头等舱,谁也不会想到,

他那两只豪华大铁皮箱里装的就是他研制的电台。到香港后,李强和黄尚英刚从船上下来,就有警察上来检查。李强面不改色,悄悄塞给警察四块钱。警察看都没看就用粉笔在箱子上画了一个记号,把李强当作了一般的走私者。无线电器材安全带进九龙后,电台设在弥敦道某小街一栋房子的四楼上。1930 年 1 月,沪港成功通讯,拉开了中共利用无线电远距离通讯工作的序幕。第一条划破夜空的重要消息,就是邓小平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取得成功。

电台有了,决定电台安全的无线电密码是又一个难题。简单的摩尔斯码很容易被破译,所以必须编出一种绝对安全可靠的密电码。关键时刻,周恩来亲自出马,编写了与收发报机相匹配的密码本。由于周恩来当时化名“伍豪”,这部密码本被党内同志统称为“豪密”。

据传,国民党密码破译第一干将黄季弼曾苦苦钻研中共密电,却发现根本无法下手。据黄季弼说,当时中共采用的是被称为“复译法”的二重作业密码体制,这种密码体制的优点是能够在电报中实现“同字不同码,同码不同字”,不给对手分析的机会。这也是那个时代最先进,最安全的密码体制。在上海,周恩来亲自保管密码本,亲自翻译电报。他有重要事情不在,就由邓颖超翻译,“豪密”也由于保密性强,成为了我党之后主要的电台密码之一,一直到国民党败亡,这套密码始终未被破译。

学员被捕 狱中斗争

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,苏区和红军急需无线电人才,1930 年 9

月,中央决定采用集中办训练班的方式培养电台人员,从各地抽调 16 个同志到上海办了一个无线电培训班,在法租界巨籁达路四成里租了一栋楼房,挂出“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”的招牌,学生对外的名义是工人,教师对外的名义是经理或工程技术人员。

由于这个工厂既没有机器轰鸣声,也不生产产品,很快引起了敌人的注意。1930 年 12 月 17 日下午,天下着濛濛细雨,19 名学员在张沈川、曾华伦 2 个教员指导下,戴着耳机,正在二楼学习收发报,突然,六七个侦探破门而入,其中还有一个是外国人,用手枪指着众人。特务在厂里搜查后,将张沈川等 21 人全部抓走。在敌人搜查过程中,学员谢小康乘敌人不注意时将二楼前屋窗帘的右角拉开,这是预先约定的暗号,表示出了问题,这才避免了更多同志被捕。

张沈川等被捕后,大家改名换姓,任凭敌人如何拷打和利诱,始终对党的机密守口如瓶。由于没有掌握任何直接证据,敌人只能将他们转到南京陆军监狱。1931 年 4 月,国民党军事法庭根据所谓“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”,判处其中 17 人有期徒刑九年七个月,另外 3 人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。因为条件恶劣,很多同志病逝在监狱中。一位同志在临终前,不断地对大家说:“要听‘妈妈’的话!”大家都明白,那是叮嘱大家要听党的话。

在沈忆琴看来,中共中央第一电台的建立,可以看出党的事业筚路蓝缕,最初的岁月,没有远大的理想与坚定的信念,是很难坚持下来的。“我是中学时代就入了党,在当时也算地下党员。虽然年纪小,但是每次出门贴标语,也都有出去了就回不来的觉悟。是什么支撑我们?就是理想与信念。”

训练班被破坏后,李强等同志按照党组织的指示,仍继续留在上海分散培训人员,建立地下电台,开展党中央同共产国际、苏区之间的秘密通讯联系。1932 年,中共中央的声音已能通过秘密电台及时传达到全国各大根据地,对领导各地的革命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。